

伟大的转折*

60年前的7月7日，就在我们今天开会的卢沟桥这个地方，开始了连续8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抗战一爆发，人们就着手了对事变的记载和评述。其中有后人无法代替的，但当时所知肯定是有限的。如今岁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那段历史，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比较全面的认识了，虽然就像对于其他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一样，总有这样那样的分歧，要继续研究讨论。

照我们现在达到的认识来说，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中国在近百年里头一次取得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内部政治力量这时头一次发生了有利于人民方面的对比。这两者集中起来，从实际力量上准备了新中国代替旧中国，为最后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两大基本矛盾开辟了道路。这两大基本矛盾，一是民族丧失独立；一是社会生产落后，各方面缺

* 这是出席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少近代化。抗战以后紧接着的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三年多就全局分晓，突出显示了抗日战争推进历史转折，选择中国前进方向的作用。第二，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同时也是人民战争。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它所提出和坚持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贯穿整个抗战过程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无从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也没有什么东西保证会坚持下去，而不遭中途夭折。回顾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的结局，就会明了这一点。从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方面看，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同样地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抗日战争是全中华民族、即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先辈共同进行的，他们有共同的过去，也就有共同的未来。第三，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重要性。中日两国都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发生了极大变化。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前进的道路，是中日两国关系上惟一应该遵循的道路。这是那场严酷战争给予

人们的根本教训。日本最近公布的日美军事合作新协议，被国际上一致评论为是给日本自卫队对外作战扫清道路。中国和亚洲人民自然地要表示出他们的关心，人们不应该淡忘历史的教训。第四，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中国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和东方的胜利。了解这方面的事实，不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也涉及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特别是东方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巨变。抗日战争是那些巨变的开始。抗日战争有何重要意义，这一些，我想是很容易看到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抗日战争不但时间最长，规模空前，中国遭受的苦难、牺牲也最惨重。战争发生时，日本是一个实现了近代化的军事强国，中国是一个处在半中世纪状态的工业、政治、军事落后的弱国。双方举国以赴，连续恶战8年的结局，日本彻底失败，中国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怎么发生的，根源在哪里？物体不能从静止状态去简单了解，物体只有从运动中才能认识它是什么与不是什么。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中国民族空前剧烈的运动。人们很自然地要提问：从抗日战争那场剧烈运动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性格、什么特点？中国抗战当然是在一定国际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但它的面貌、格局和结果，最终是取决于自身因素，而非取决于外在因素。这个事实很容易确切证明：抗战8年，前段4年多，中国是在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单独对

日作战的。也正是由于这4年多中国的抗战，迫使日本把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扩大、延长为太平洋战争，引起东方全局变化的。因此，探讨和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无疑地具有重要的和深层认识的价值。

关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抗日战争中体现的性格和基本特点怎么样？我以为大致上可以这样说：

一、在大敌当前，民族存亡的决定关头，中华民族是一定可以觉醒起来、团结起来的。在这个时候，对立阶级、不同利益的人群一定要转而服从民族生存的共同利益。其中有生存下去的现实需要，也有传统民族大义的驱动。国民党与共产党十年内战转变为合作抗日，使中国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抗战进入中期以后，双方又摩擦不断，以至局部军事对抗。但一直到抗战结束，统一战线的形式仍然保持着。事情就在于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要受民族共同愿望的制约。敌人压迫的客观形势不改变，他们共同对敌的战线也就不会改变。

二、人民大众是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力量源泉和最终支柱。他们抗日的意志和力量释放出来了，中国就能够顶住任何压力，就能够振起固有的坚强民族精神。全面战争开始，“抗日光荣，抗日必胜”，是抗战舆论的基调。从不同社会层次一致发出的声音，表示出对抗战前途和中国复兴满怀信心。年长参政员张一麐在抗战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七”是中国人最光荣的一天，比双十节还要光荣。希望大家抗战到底，“让中国人永远竖起一条脊梁”。

1939年2月，陈嘉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的提案，全文30个字：“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抗战二周年，朱自清在《这一天》的文章中说：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中国不但有光荣的古代，如今也有光荣的现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这些言论要求，真切反映了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坚决要求抗日，竖起脊梁，不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决心和激情。日本当时也有人了解和重视这个事实，并且担心日本横蛮压服中国，与中国全民族为敌，给日本带来严重危险。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一些头脑冷静的中日问题的研究者，包括首相近卫智囊团人士、“满铁”研究人员、天津《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撰稿人等，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中日两国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它不久将作为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展现在我们面前。“华北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整个支那问题，我们重视的是整个支那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对付支那统一政权的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国民政府的武力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四亿民众的觉醒与复兴的命运，并不是日本一国势力所能长期压服的”，“现在日本帝国真正面临着兴亡歧路的选择”，等等。日本当权势力根本无视这个事实，不把民族复兴思想日益增长起来了的4亿中国人放在眼里，确信日军只须“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结果走上了最后覆灭的道路。

三、爱国、维护民族利益，是含有新的时代内容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准则。“汉奸国贼”罪名同科。日本从统治中国的需要出发，把一些老牌亲日分子、堕落文人看做中国人的合格代表者，“有力人物”。在占领华北、华中以后利用他们充当头目，建立傀儡政权。实际他们帮不了日本人多少忙，汉奸卖国贼面目的公开使他们不为普通中国人所齿。汪精卫叛国投敌，日本一度寄予相当的期望，又是“还都”，成立“国民政府”，又是双方签订“互相承认”条约。至今东京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悬挂的历次重要外交事件图像中就有日汪“互相承认”签字仪式的巨幅照片。但是汪精卫一经投敌，就陷于极端孤立，使日本大失所望。裕仁天皇三弟崇仁1944年在南京日本派遣军总部与中下级军官讨论战争形势、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汪伪是他们着重谈到的问题之一。崇仁在回答参与讨论者提出的“国民政府没有力量”、“国民政府没有吸引力”等等问题时说，它为什么没有力量，“这不是因为民众对它不信任吗”？那么，为什么民众对它不信任？说穿了它不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是日本掩饰其侵略主义施展的一种小伎俩。“其下层官吏、军人，大部分都是由于抗战意识薄弱分子、或想利用日本发财而日本又被他们空喊亲日所蒙蔽的一伙人所构成，民众对这样的政府不信任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崇仁这位正直勇敢、实话实说的皇族成员，讲出了汪伪及其同类为什么受到群众抵制的实情和本质。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崇尚民族正气，唾

弃认贼作父的败类，是一般遵行的通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石敬瑭、张邦昌一类历来是受诛贬的。这个文明社会的通则，如今是增强了的民族凝聚力反映在增强了的价值观观念准则上。

四、中国人是有能力在历史转折关头，汲取世界先进思想，结合中国实际去从事革新自己民族命运的斗争的。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是代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自己环境条件和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和认识。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则是代表了孙中山以后的先进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条件环境认识和应当如何前进的主张。它们都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不必说它们怎样完美无缺，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直接或间接与今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其中《新民主主义论》直接产生在抗日战争过程里，它指陈的基本内容、社会变革全都由后来的历史所检验、证实。民族独立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开通了。事实俱在，不需要论证。

以上叙述，如果基本不错，我想也不能就算是对于前面提出的从抗日战争那场剧烈的运动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具有怎样的性格和特点这个问题的全面回答。但是，有一条可以充分肯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潜力，其中包括悠久历史和高度文化的潜力、接受和发展先进思想的潜力是不应当低估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错误就是自恃霸权在握，不可一

世，在总体上、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上完全低估了它的对手。这适用于研究抗日战争，或者也适用于估量中国的现实。

历史事实有一目了然的，也有并非黑白分明的。“七·七”事变过去了60年，学术界对八年抗战得出了许多重要认识，但同时，仍有各种分歧摆在人们的面前。抗日战争那段历史过去了，它与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联系并没有完全过去。可以肯定，某些分歧在相当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照我们看来，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科学性。何谓科学性，不管有谁是否下过什么定义，历史科学的研究，归根到底，一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要求是客观的，原则上是带有共同性的。无论你主张哪样的方法论或历史观，都要遵守而不能排斥这样的要求。一切严肃的、根据事实、言之成理的不同方法论、历史观的研究者，都有可能对历史提供重要的或有益的认识。我们要反对宗派主义，排除门户之见，要同一切严肃的、根据事实、言之成理的不同方法论、历史观的研究者讨论问题，汲取他们的成就，听取他们的批评，改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去真正实现提高科学水平的目的。这应该是一种科学上的自觉，只可坚持，不可动摇。或者有人说，抗日战争太复杂，这样的要求未免不现实。回答是历史研究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上的克隆技术，要再现出一段同

样的历史；有许多细节人们是永远不会知道了。但是历史上有过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永远也不会依照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时改变。历史的大纲节目、基本轮廓、前因后果、大是大非、运动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吸引人无止境的追求了。每一段历史都是检验科学研究能力、人们思想力量的场所。抗日战争史也无非是这样一个场所。真理的光芒有时是会刺眼的，服从真理的人都会勇敢地去面对它。

推进科学是众人的事业。我们期待这次有国内外知名学者、各方面专家参加的讨论会，将使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再迈上一个台阶。